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始论题中的三民主义评价

董四代

(武夷学院 政教部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现代化讨论中,大多数学者认同了以社会主义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之相伴随的文化讨论又在“西化”、“本位文化”的争论中形成了“中国化”的命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性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使之与中国社会发展相贯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关键词:** 现代化讨论;文化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6-0023-04

## A Valuation of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n the Initial Proposition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DONG Sidai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modernization discussion among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n 1930s, most scholars chose the socialism as the path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cultural discussion following with it formed Chinese proposition in the argument of "Westernization" and "standard culture", which created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On such backgrou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estimated Sun Yat-sen'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correctly, caused it to link up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cy.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discussion; cultural discussion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of SUN Yat-sen; new democracy

20 世纪 30、40 年代,在学术界持续多年的现代化讨论中,“西化论”与“本位文化论”各执一端展开了争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对西方文明进行辨析并就“中国化”问题进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进行评价,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厘清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民主主义的关系,对认识中国现代化追求与社会主义选择的历史根据有重要意义。

### 一、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现代化讨论中的社会主义选择

孙中山是 20 世纪中国站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提出了以民族、民

收稿日期:2012-06-20

作者简介:董四代(1947-),男,河北蠡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纲领。他根据时代变化,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三民主义,并从中表达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他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指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于反对帝国主义而已。”<sup>[1][P676]</sup>“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同时他又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sup>[1][P677]</sup>“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并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sup>[1][P678]</sup>后来在阐释三民主义的讲演中,他又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sup>[1][P593]</sup>

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展开,三民主义也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中国社会现实与孙中山的理想形成了巨大反差。在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问题展开了讨论。参与这场讨论的学者虽有各自的政治倾向,但讨论却是围绕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展开的。董之学认为“1926年大革命时代所公布的经济纲领,不但早已被遗忘了,就是对于纯粹以研究中国经济为目的的史学家,也认为那已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它从没有被人搬到实验场中充分地大胆地试验过。”<sup>[2][P233]</sup>他还就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障碍说:实现现代化必须“凭借广泛的政治力量来扫除封建势力掩护下的残酷剥削与消灭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支配”。<sup>[2][P240]</sup>罗吟圃则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第一是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第二是国内军阀混战的频发和农村经济的破产。”<sup>[2][P273]</sup>这就把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归结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亦英认为中国已有的一些现代化成分也只是抄袭了西方各国的皮毛,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仍然受到外资的排挤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单纯技术上的现代化并不能发挥作用,因而必须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也是这次现代化讨论的重要内容。张素民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受节制的资本主义”<sup>[2][P230]</sup>道路。戴霭庐则认为:采用资本主义,“未免和世界潮流背驰”,“理想上我是主张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因为许多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根基的,一旦采用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注)的方式是绝对办不通的”。<sup>[2][P264]</sup>多数人都主张限制资本主义或明确地提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他们是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讨论问题,也就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知识界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虽然角度不同,观点有些分散和不够系统,但却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确认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由于没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如何扫除现代化的政治障碍提出可行的思路,也没有对工业化与传统社会基础变革的关系阐释清楚,更没有对如何既发挥资本主义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又对它加以节制,以及通过什么样的过渡形态走向社会主义等问题阐述明确,因而也就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道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宣称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正统代表,现代化讨论中一般也没有涉及对三民主义的评价,但这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评价新三民主义,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前提条件。

## 二、“西化”、“本位文化”、“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现代化讨论相伴随,学术界又围绕文化建设问题展开了一场“西化”与“本位文化”的讨论。陈序经说“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根本上也是西化的思想。他的理想中人是美国的华盛顿。西洋文化,是他的革命环境。他反对中国的旧文化,推翻专制的政体,而建立共和的民国。总之南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思想是最先进。最后归结的说到中国文化的出路,无疑是要从彻底全盘西化着手。”<sup>[3][P389]</sup>一些人以文化的民族性为根据对他的观点进行批驳。他又强调说“反对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人,以为每一民

族,有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文化成为民族的生命。他们的结论是:文化亡,则民族亡。这种意见的错误,是在于不明了文化乃人类的创造品,民族的精神,固然可于文化中见之,然他的真谛,并不在于保存文化,而在于创造文化。”<sup>[3](P407)</sup>

在陈序经西化论的影响下,思想界活跃了起来。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人对他随之附合,以西化为取向展开了对中国文化的批判。1935年初,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对“西化论”进行反驳,其中说:在这种思潮下,“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得中国人”。<sup>[3](P417)</sup>他们主张以中国为本位进行文化建设,即“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验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是要清算从前的错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sup>[3](P421)</sup>

在双方各执一端的情况下,学术界展开了中西文化合理性的讨论。许多学者参与其中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化讨论与现代化讨论相联系,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取向。李麦麦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讨论文化问题,认为:关键是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文化,“中国现在要建设资本主义文化,当然只能以革命的资本主义文化为榜样,不能以反动的资本主义文化为榜样”,<sup>[3](P612)</sup>并且提出要超越资本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原则下进行文化建设,“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人类才能把其全部力量用来和自然斗争,才能建设伟大的文化”。<sup>[3](P609)</sup>李建芳则明确提出“我们对于西洋资本主义文化所取的态度是应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为态度的。……被压阶级的思想家只要能从较高阶段的观点来接近资本主义文化,他不但不会为过去的文化所屈服,反而能利用过去的文化为达到自己目的一种工具。”<sup>[3](P629)</sup>张申府提出了“中国化”的命题,他说“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sup>[3](P635)</sup>时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嵇文甫提出:“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把世界上进步的学术文化尽量吸收,使自己迅速壮大起来。”<sup>[3](P691)</sup>但这既不是国粹论,也不是全盘西化。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讲,“所谓‘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sup>[3](P699)</sup>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讨论,但在1938年10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后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有必要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4](P500)</sup>这就与文化讨论中的“中国化”论取得了共鸣,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39年,艾思奇在批驳叶青的观点时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正因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万能的’。”<sup>[3](P650)</sup>因而“决不会因为要中国化而丢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相反地,要真正的中国化,就是要真正地能够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要真正能‘理解、精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sup>[3](P651)</sup>这样,就在文化讨论中提出的“中国化”背景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中对新三民主义的评价

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国共合作时期对三民主义的再阐释。它把民族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相联系,把民权主义与反对资产阶级垄断国家政权和人民主权相联系,把民生主义与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相联系,使之出现社会主义的取向,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孙中山很早就不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可行的发展选择,而是提出把社会主义作为更

好的发展道路。”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恶果，“因此他确信，社会主义是抑制资本主义不良后果所必需的”。<sup>[5] (P35)</sup>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之时，中共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背景下，对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早在1938年，《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说过“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sup>[6] (P111)</sup> 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前中国最有影响的革命学说，但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对它又有不同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下认识三民主义，就对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更加明确和清晰。1939年，艾思奇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时说“如果有人说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他的党现在所拥护的是三民主义的纲领，所努力的是三民主义的纲领实现，那我们正好答复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表现。”<sup>[3] (P653)</sup> 他还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把三民主义纲领的实现作为最后理想，而是把它当作经过中国的道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的阶段。所以，中国无产阶级把自己的三民主义的事业看做整个共产主义的事业的一部分，这是与普通的三民主义信仰者不同的，也正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所要努力实现的三民主义，是最彻底的三民主义，这一点也是与普通三民主义的信仰者不同的。”<sup>[3] (P654)</sup>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了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点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sup>[4] (P648)</sup> 不同部分是：在民主革命阶段上有没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宇宙观上三民主义是二元论或唯心论的民生史观，共产主义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共产主义者理论与实践一致，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中许多人理论与实践不一，没有革命彻底性。<sup>[4] (P649)</sup> 他还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阶段，指出“新三民主义或真正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sup>[4] (P650)</sup> 即“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sup>[4] (P653)</sup> 并且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sup>[4] (P635-636)</sup>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3个多月后，洛甫（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又提出“真正孙中山的信徒，应该努力为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的全部实现而奋斗，应该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为民族、为民主、为科学、为大众而斗争的政治思想，给这种政治主张、政治纲领、政治思想奠定科学理论的基础，纠正与淘汰其中一切消极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使三民主义更能贡献于抗战建国的事业，更能贡献于新文化的建设。”<sup>[3] (P669)</sup>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再次肯定新民主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一致性。并且指出：“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觉悟的表现。”<sup>[7] (P321)</sup> 因为在国共两党内战时期，蒋介石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共产党的力量很小。但他同时又说“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sup>[7] (P322)</sup>

同年九月，许涤新在《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中，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的内容，论证了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合理性，并且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经济”，<sup>[8] (P1061)</sup>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走进社会主义经济的跳板”，<sup>[8] (P1064)</sup>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是与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一致的”。<sup>[8] (P1068)</sup> 他同时还强调说“毛泽东先生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是有其实现的根据的！这不是浮现在脑海中的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将要在我国展开的社会经济制度。”<sup>[8] (P1070)</sup>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共产党人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三民主义进行认识，阐述了它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意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伟大成果，那么可以说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它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这一成果的取得在客观上是与现代化讨论和文化讨论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说现代化讨论中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文化讨论中沿“西化”、“本位文化”论题向“中国化”的逐步（下转第61页）

潮》2004年第6期;郑德金《瞿秋白在〈红色中华〉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新闻大学》2004年第2期;凌步机《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党史博采》1998年第2期;刘维陵《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前夕的〈红色中报〉》,《新文化史料》2000年第1期等。

参考文献:

- [1]韩云.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中华》报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
- [2]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N].红色中华,1934-1-26.
-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N].红色中华,1934-2-14.
- [4]陈云.为收集粮食而斗争[N].斗争,1934-2-2.
- [5]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批准减少食米的请求[N].红色中华,1934-3-29.
- [6]亮平.红军等着我们的粮食吃[N].红色中华,1934-6-9.
- [7]中央组织局,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动员的紧急指示[N].红色中华,1934-6-30.
- [8]编辑部.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N].红色中华,1934-7-5.
- [9]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 [10]邓家琪.苏区文艺运动资料[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 [11]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13]洛甫.关于我们的报纸[A].编委会.红色号角[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14]张鼎水.奇怪的河田乡分田[N].红色中华,1932-1-13.
- [15]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N].红色中华,1933-8-10.

(责任编辑:吴贇)

(上接第26页)深入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评价三民主义、提出新民主主义创造了条件。这种政治与学术的互动虽然不是十分自觉的,但却说明关系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表达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的作用,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论题集中化”的方式把握社会发展的主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吸收前人的理论成果,确立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变革社会现实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黄彦.孙文选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 [2]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上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8.
- [3]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8.
- [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5]苑洁.后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 [6]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8]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下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8.

(责任编辑:郭荣华)